

21 12

屏山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总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屏山县委员会
文史和学委员会编

屏山文史资料

第 17 辑

(总第21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屏山县委员会

文 史 和 学 习 委 员 会 编

1998年7月

2073/21

《屏山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顾问：戎远恒

主编：郑伯康

副主编：齐文字 刘时行（聘）

责任编辑：陈善斌（聘）

编委：牟本乾（聘）姚熙（聘）朱培东（聘）

陈济洲（聘）毛晓岚 余注海（聘）

周霞（聘）

屏 山 文 史 资 料

第 17 辑

（总第21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屏山县委员会

文 史 和 学 习 委 员 会 编

电话：（0831）—5721262 邮政编码：645350

屏山县精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承印

内 部 资 料

目 录

屏山“文化大革命”回顾.....	胡富强 (1)
十年浩劫 群众遭殃——屏山	
“文化大革命”见闻.....	张易然 (50)
回忆屏山县平反纠正冤假错案落实	
“四个运动”的政策概况.....	胡富强 (60)
“文化大革命”期中屏山县两所公	
办中学掀“四类”情况.....	巫锡乾 (66)
参加组建屏山县人民法院的	
日日夜夜.....	杨正甫 林夏云 (71)
回忆屏山县土地改革试点工作.....	余注海 (78)
“回光返照”——国民党反动派宜	
屏大逮捕50周年感述.....	齐国材 (83)
农业合作化——屏山人民走过的道路.....	樊吉星 (89)
屏山双季稻栽培已成为历史.....	樊吉星 (92)
龙华镇行政区的变化.....	尹自雄 (98)
屏山苗族简介.....	(苗族) 王富英 (101)
中学时代生活琐记.....	齐治元 (103)
屏山古摩岩石刻——文昌行祠.....	郑世钦遗稿 (106)
中都白塔.....	李品铤遗稿 (109)
黄山谷(涪翁)曾旅游到屏山.....	聂钦铨 (111)
锦屏杂志 (九)	

5、文昌洞 5、涪翁洞 52、丹霞(玉皇)洞

怪字联的来历和音义..... 陈善斌 (112)

新市镇闻见杂录(续).....巫锡钧(120)

采风录——诗歌选页

忆秦娥·痛悼邓老 菩萨蛮·捕鱼

西江月·求雨.....朱学林(125)

祝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古体).....张泽霖(126)

江泽民主席出访西亚五国载誉归来(七律二)、

大国无戎会晤(七绝二).....姚 熙(126)

江城子·丁丑重阳即兴.....牟本乾(127)

1997年11月5日随县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同人参观欧

家村、雪沱电站(七绝二、对联一).....陈善斌(127)

屏山“文化大革命”回顾

胡富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它给人们留下的创伤还难以愈合。为了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下，我决心鼓起勇气，撰写本文，敬献给读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尚需发掘和澄清。特别是探寻纷繁复杂的各种人物、事件背景和它的内在联系，以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等，更需要县党史、文史等有关部门及诸方面的协作配合，才有可能更完整而准确地完成。由于时隔20多年，回顾难周，加之写作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进行指正补充。对提供资料的部门及同志，在此表示深谢！

※ ※ ※ ※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由执政党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由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并号召全民参加，笼罩着“反修防修”的神圣光环，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性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形式是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和国家的黑暗面，全面夺权。显然，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初是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后来在文化领域不断升级发展到批“三家村”、“黑店”、“黑帮”。“山雨欲来风满楼”。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序幕。

当时说的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其实，这场“文化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确实是一场严重的大灾难和大内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伟大事业带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给人们留下的是极为深刻而沉痛的历史教训，因而称为“十年浩劫”。

屏山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就在上述前提下，中共屏山县委根据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5.16通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决定》（即《十六条》）和毛泽东同志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省、地委的实施部署下开展起来的。

上述三个文件的公开发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当时，中共屏山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省、地委的战略部署，加强了对“文革”的领导。县委根据《5.16通知》精神和省、地委的实施部署，于1966年5月发出“组织各级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6月5日，县委召开机关干部和职工动员大会，号召干部、职工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8月，成立了“屏山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8月1日，毛泽东同志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

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9月，县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接待外地来屏山“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的红卫兵。他们贴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进行激烈的煽动活动。加之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既互相勾结，又互相利用，既互相吹捧，又互相争夺。他们拉帮结派，控制舆论，兴风作浪，制造灾难，而且长达10年之久。他们在政治上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夺权”；在手法上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在目的上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乘机夺权，篡党窃国，建立封建法西斯专政。在他们的鼓吹煽动下，到1966年12月，屏山全县城乡各种“革命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在红卫兵南下煽风点火的推动下，自发而全面地、自向地开展“文化大革命”。但因各单位群众对“文革”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为“造反派”（少数）和“保守派”（多数），展开了颇为激烈的斗争。当“文革”进入高潮时，完全形成一种无政府状态。不仅县文革领导小组指导无力，而且县委、县政府的指挥也不灵了。他们提出所谓“革命”需要粮、钱、物等，就得及时予以解决。否则，县文革领导小组、县委、县政府领导机关也要由动力变成他们“革命”的对象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966年《5.16通知》下达到1968年7月屏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为第一阶段；到1971年6月中共屏山县委第四次

代表大会的召开为第二阶段；再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开展夺权斗争和建立新的政权机构。

自从县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后，6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八条指示是“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要打人和侮辱人”。这八条指示贯彻后，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在林、江集团“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煽动下，16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那些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的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社论认为“这场革命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他们就刮阴风，造谣言，制造混乱，转移目标，设下重重阻碍，束缚群众手脚”。社论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这与中央八条指示显然是对立的。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这时，《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时，屏山的造反组织遵循以“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1月22日，开始夺了屏山县的党政大权，各区、

公社（镇）的领导机关及城镇农村基层单位也先后普遍受到冲击和夺权，领导干部遭到炮轰、火烧、围攻、揪斗、打倒，党的活动被迫停止，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工作和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他们借口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斗争不止不倒”。因此，“文革”一开始，说的就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由于不适当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背离了科学的方法论，违反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等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导致“文革”完全形成一种无政府状态，盲目而自发地自由泛滥，造成不堪设想的灾难性和内乱性的严重恶果。

《5.16通知》指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入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揭发上层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它既不符合马列主义，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但它还要求会党“高举无产阶

组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民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因此，在“文革”初期，卷入红卫兵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信赖，响应“造修正主义的反”的号召，怀着“捍卫红色江山永不改变颜色”的一片赤诚。红卫兵运动是当时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兴起又加剧了“文革”的破坏性，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也给青年人本身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文革”的目的，《十六条》中规定：“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艺术，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这次运动的依靠力量，《十六条》中规定，“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但没有明确划分左派、中派、右派的标准，从而加剧已发生的分裂和派别斗争。

这次运动的方法是“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要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所谓“四大”的核心是“大字报”，毛泽东同志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应当永远使用下去。”从而更加助长自发性的过火斗争和已出现乱打乱斗的作用，使运动失去控制，民主和法制都遭到践踏。加之党内“走资派”又没有明确的是非标准，似乎就是指手有权，而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者。“走资派”是一小撮，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团结95%的干部。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也没有搞清楚。由于是非不明，界限不清，而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打“走资派”，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我们党内的各级领导干部。打倒了，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就造成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形成一种盲目而自发的、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大字报在“文革”中的作用不外是制造舆论，扩大声势；矛头向上，煽动造反；壮己声势，压制对手；断章取义，派斗利器；罗织罪名，组织围攻；揭发隐私，侮辱人格；传播流言，助长错误；泄露机密，损害

国家。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在“文革”中，实际上已演变为大批判、大揪斗、大体罚。这些都是极其粗暴的、破坏民主的行为，但却冠以“大民主”的称号！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把“文革”引向深入，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分别组织代表来京参观，并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据此，屏山中学派驻了工作组，以加强领导。10月15日，组织红卫兵代表128人，教职工代表3人，由县文革领导小组指定专人带队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

林彪在接见大会上讲：“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他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并号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此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城乡各地迅猛发展，势如燎原。

这时屏山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于11月16日，开始外出串连，学校停课闹革命。同时，国家机关干部，企、事业职工的大串连发动也逐步走向高潮。这是造成大灾难和大内乱的一个严重步骤。他们走向机关，冲向社会，开始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四旧”。对他们认定的所

谓“封、资、修”的事物实行砸毁，使一些文物古迹遭到破坏；他们四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大字报、发表演说，并采取了不少的过火行为。对他们所认定的所谓“阶级敌人”，实行揪斗、体罚、抄家；把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教师、干部当作“保皇派”、“牛鬼蛇神”、“黑爪牙”来批斗。把一些老街道都改为“反帝”、“反修”、“红旗”、“红卫”等千篇一律的名称。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肯定了学生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这是运动的主流”。社论说：“我们工人农民，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用任何形式，来挑动工农斗学生。”并号召：“工人农民和革命学生团结起来，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战斗。”致使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难以正常工作。

1967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下达后，两派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使党政机关的领导人受到林彪、江青一伙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他们被当作“黑帮分子”、“钻到党政机关内部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甚至发展到隔离反省、关牛棚、进监狱，对强加在干部头上的“罪名”遭到抵制时，则进行人身摧残，打击迫害。要他们每天除有针对性的学语录，进行所谓的自我反省、自我改造外，就是安排体力劳动或接受批斗。造成干部们终日提心吊胆，不知那一天要被整下台！但在这种情况下，《5.16通知》还指出：“绝大多数党委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1966年6月5日，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紧急指示，

宣布“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销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决定”。从此，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并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更加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

“林、江”集团，利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把“左”倾错误进一步推到极端。他们指使和放纵一些冒险、投机的人，煽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上下左右，遥相呼应，互相支持的大内乱，使全县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遭到巨大的破坏。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中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其实质，正是“夺权”。早在《5.16通知》中，已明确提出要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十六条”中提出：“要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因此，全面夺权是“文革”发展的必然结果。元旦社论号召“展开总攻击”，也是发布全面夺权的大动员令。上海“一月风暴”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之后，屏山也同全国一样，1月22日，由造反的群众组织立即掀起一场夺取县委、县政府领导权的暴力行动。致使全县各组党政领导机关及下属工作部门均陆续瘫痪，党组活动停止，生产工作难以进行，造成更严重的灾难和混乱。凡是最高指示、社论、会议公报的公开发表，他们就雷厉风行地组织群众游行示威，高呼“毛主席指示我照办！”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誓死保卫党中央！”“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等口号。还狂呼什么“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党内有特权阶级！”“走资派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等等。

上海夺权，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并指出：

“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说：“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社论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

“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社论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因此，在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中，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林彪、江青一伙是寸步不让，争夺十分激烈。他们颠倒敌我，混淆是非，鼓吹极左思潮，进行“全面阶级斗争”、“全面夺权”、“全面专政”，使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级组织成为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同时造成了大规模的

“革”与“保”等各种乱揪乱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严重恶果。

1967年1月，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规定：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行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提倡文斗，反对武斗。中央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串连，真课间革命；要求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但由于林彪、江青一伙，将二月份奋起抵制“文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小将为“二月逆流”活动，借机掀起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政各级领导干部。2月22日，屏山根据上级部署，也进行了“二月镇反”。先后逮捕造反组织的大小头头64人，并把有的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继而又把有的群众组织说成是“保守组织”、“保皇派”，把大小头头说成是“坏头头”、“小爬虫”、“变色龙”等等，给他们安上一些“罪名”，戴上一些不应戴的帽子。

为了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经济，克服党政军民分离的被动局面，根据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关于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指示精神，屏山县人民武装部指派军队干部主持成立了“屏山县生产办公室”（以军队干部为主，吸收地方干部和“造反派”头头参加），代替党政行使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指挥权。3月13日，又改为“屏山县生产委员会”。4月19日，再改为“屏山县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作为过渡性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全县的工